

<https://doi.org/10.70731/1ze3zc05>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Frontier Management Issue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ingzong of the Liao Dynasty

辽兴宗朝边疆经略问题研究述评

Jiarun Li ^{a,*}

^a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KEYWORDS

*Liao Dynasty;
Emperor Xingzong of Liao;
Academic Historiography;
Frontier Management*

关键词

辽朝; 辽兴宗; 学术史; 边疆
经略

ABSTRACT

The reign of Liao Emperor Xingzong (1031–1055) marked the dynasty's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with frontier governance reflect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Though border policies prioritized conflict avoidance, impulsive military campaigns destabilized frontier regions and drained state resources. As a key focus i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Liao frontier governance falls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terstate political relations, analysi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policy shifts, and studies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systems. While no comprehensive monographs exist, numerous academic papers have explored this topic.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search on Xingzong's frontier governance to clarify academic frameworks and facilitate further progress in Liao frontier studies.

摘要

辽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年在位）统治时期，向来被视作辽王朝由盛转衰的开端，这一时期的边疆经略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其统治下，边疆事务上秉持轻开边衅的思路，贸然发动战争或挑起争端，致使边境地区陷入动荡不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边疆经略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目前学界研究成果虽多但较为分散，主要围绕政权间的关系、某一事件、某一政策变化以及边疆管理机构 and 制度而展开，虽然迄今较少有专门性研究著作问世，但已产生数量可观的论文。对辽兴宗朝边疆经略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以期未来更好有助于辽代边疆经略问题的研究。

1. 引言

一段时间内边疆经略的研究，似应包含边疆事务的若干层面，侧重点在于处理政权间的关系以及疆域边界（边缘）等角度。不同地域社会势力之间的碰撞是复杂而激烈的，这一时期相互冲击的潮流尤以“南北”（“契汉”）民族碰撞为最。这种碰撞所蕴含的必然性，是否能够转化为推动政治发展的强大动能？当动能被有效激发时，是否可以促使社会朝

着稳定的方向发展？由于辽兴宗朝史料奇缺，似应深掘辽朝边疆经略发展至兴宗朝所呈现出特定状态的深层次原因，重视辨析和运用相关史料，从不同主体、不同角度入手，进行综合分析，以准确把握该时期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脉络。本文即是对辽兴宗朝的边疆经略相关问题的若干成果进行梳理和学术史回顾，今不揣鄙陋，略做探讨，不妥之处请指正。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873419469@qq.com

学界针对兴宗朝边疆问题主要围绕漠北、女真、辽宋、辽丽、辽夏关系开展，针对“重熙增币”、设立西京、经略高丽、开拓草原丝绸之路等问题展开，兴宗借辽、宋、夏三个政权间地缘发展变化，斡旋宋夏，同时改变辽经略中原和西南的策略，有学者评价“总的看失大于得”^[11]。姚从吾对辽兴宗时代的宋辽增币交涉与辽夏战争有专题讨论。^[12]有学者指出，辽在辽宋夏三国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辽对夏宋关系的插手和干预，使得其自主权受到辽的制约，为辽所操纵。^[13]林荣贵认为辽朝统治集团坚持与汉族同祖同根的内向观念，使北疆各族对于中原的内向力呈现新的发展趋势。^[14]

2. 兴宗朝边疆经略的主线

兴宗朝的正统问题、地缘政治与封贡体系^[15]十分复杂，这些变量是影响辽兴宗边疆经略决策的关键线索。辽朝建立起的复合型世界秩序，体现了多元文明的相互交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融合和重塑，打破了所谓“文明的断层线”，对费正清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观点进行修正和挑战。^[16]万晓认为由于宋的存在，以辽为中心的朝贡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华式朝贡，形成两极平等、二元朝贡的东亚体系，似应考虑“名”与“实”问题，在各方面厘清朝贡关系的物质与观念特征。^[17]郭康松认为契丹人接受中原的夷夏观念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至兴宗时，以辽为正统的思想拥有一定的市场，至“重熙增币”时，已不满足于与宋平起平坐，而想做“宗主”。^[18]辽自认为是正统，重熙七年兴宗就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策进士。刘浦江认为辽人中国意识的觉醒是兴宗以后的事情，重熙年间起开始以北朝自称。^[19]赵永春从石刻和传世文献推断辽在政权建立之初就以“中国”自诩，附会为“炎黄子孙”，并非是在兴宗以后才出现“中国意识的觉醒”，兴宗道宗统治时期辽人的思想倾向是辽宋同为中国，辽自称“中国”，也承认宋是“中国”。^[10]认为辽在兴宗朝以后利用和发挥历史上较宽泛的“中国”概念，公开宣称辽是“中国”，堂而皇之地自称“中国正统”。^[11]新近苗润博有总结“辽朝中期利用华夏政治文化对建国前史进行全面重塑”，辽之正统化潮流，“至重熙中期达到高峰”，并考既往研究对兴宗中段正统问题，认为尚嫌不足，并指出兴宗朝的正统性诉求，对外表现为辽宋对峙北重于南，与宋争锋，对内表现为作礼、改制、译书、修史诸方面迅速华夏化。^[12]

针对辽朝边疆经略的研究，应突破传统正统定义束缚，所谓“契丹、汉人久为一家”^[13]，辽金的统治者虽然出自契丹、女真，但并不认同宋朝的“正统”地位，相反却在许多方面将宋视为“藩臣”，发展至南宋甚至“愿去尊称，比于藩臣”，主动接受金为“天下共主”。^[14]历来考量边疆问题无过“华夷”，逮至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清代随着王朝立场从北方民族王朝到中国大一统王朝，最终亦否定辽金正统^[15]，但意识上的隔阂在政治实践中难以贯彻。对于多民族政权的现实，在边疆经略的具体决策中贯彻一体化治边思路，体现“华夷一家”的应对思想是可以想见的。其手段无非于德化怀柔或是征讨压制，历代治边均是依靠强大国力（后勤保障）为依托，在尽量不影响内地和平稳定和既定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对边疆威胁国家安全的区域进行征讨与压制，

在维持安稳后进行“王化”之行，以保证边疆的长治久安。辽之国际关系，《辽史》有载“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固也。高丽小邦，屡丧辽兵，非以险阻足恃故欤。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16]拉铁摩尔在辨析“边疆”与“边界”问题，认为边疆是一个区域，即“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并将此区域划分为“内边疆”与“外边疆”，内边疆作为亚洲内陆部族南下的“贮存地”，是连接草原与中国的联结带（过渡地带），辽亦是发源于此。^[17]实际上，辽朝本身对于边疆的定义与传统中原王朝有所不同，“因俗而治”的政策内核不仅体现在内政处理，边疆事务亦然。边疆民族地区建置是融入契丹族“行国”统治特色的同时，又在唐朝羁縻府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辽朝保持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经济形态和文化风俗不变的情况下，采取不同民族彼此牵制，契丹尚武习气，形成以武力征讨为主，德化安抚为辅的高压边疆政策。辽几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改变了人口民族构成与空间分布，形成了“汉夷杂居”的局面，由多元逐渐走向一体。^[18]

3. 兴宗朝的对宋关系

兴宗朝的辽宋关系研究，多从“重熙增币”事件展开。李锡厚有专论“重熙增币”的章节^[19]；舒焚认为，“辽朝朝廷是一个新兴的契丹族封建主政权，宋朝朝廷是一个失去锐气的汉族封建主政权。”^[20]亦有学者指出，重熙增币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辽兴宗借机转移内部矛盾所为。^[21]陈述对此次增币行为的结果有考论，应重视汉人集团的作用，“契丹这次赢得的成功，说明了汉人在辽廷的地位可以左右大政。”^[22]陶晋生认为兴宗是乘宋之危，索地不行，以求和亲，但宋人主动提出增币，实是宋人对和亲的认知，认为其耻辱程度远高于增币。^[23]王明荪将彼时官员按战和观点逐派分析，指出契丹朝野“持温和态度来对待中原朝廷”，“不欲南侵是多数人的想法”。^[24]林翥亦有“惊悸：庆历增币与宋夏和议”专章，指出庆历增币不仅让契丹每年多得金帛且宋卑辞称“纳”，还意味着澶渊平等体制已被撬动，联夏制宋无疑是辽全面突破澶渊体制，彻底凌驾于宋之上的最佳途径。^[25]

宋朝封建主阶级统治集团发展至彼时，已呈现出锐气尽失的衰败之态，长期沉浸于安逸，内部政治腐败滋生，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与之相对的是新兴的辽朝封建主阶级统治集团，积极革新，完善权力架构与统治制度，探索适宜的经济模式，积极扩充实力。故而，宋在与辽的交锋或竞争中，只能处于被动应对甚至节节败退的尴尬境地。刘春玲论述辽境内的汉族士大夫入仕后在多领域活动的重要作用，认为“重熙增币之议”的成功也主要取决于刘六符等汉人官僚的计谋擘画，并于重熙十一年建议减轻燕、云等四州的租税以缓与与当地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26]郑伟佳认为辽在获经济利益的同时答应宋向西夏施压，压制西夏势力的扩张，维持三方均势的对峙格局，增币事件为辽宋夏内部稳定发展提供外部环境，既有一定积极意义，也暴露出各方问题。^[27]马晓伟考“重熙增币”（文中以宋视角谓“庆历增

币”)的影响,从财政数据看,庆历年间财政收入骤降,原因之一是大钱广泛铸行,如庆历初年铸重宝,从折十钱后因流通困难降为折三等,影响了北宋财政收入,导致其对财政掌控能力降低,引发经济、政治危机,从而直接促成新政。^[28]

与“重熙增币”息息相关的便是“关南地之争”与对宋的战略调整。李桂芝认为辽宋和战是辽“屡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压,同时以武力解决虚声恫吓,冀以在不破坏盟约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实惠”^[29],辽宋“关南十县的交涉”亦然。朱小琴详细分析了宋辽“关南地之争”的相关内容,北宋的“水长城”设置在关南地区,若辽占有,宋则失去屏障。^[30]宋仁宗懦弱无能,苟安现状,无恢复汉唐旧疆、统一中国之心。辽兴宗能诗善画,企图扩大疆域,但辽已走向衰落,虽宋忍让,但也无力吞食宋。“重熙增币”是两朝皇帝顺应历史潮流,双方现状决定结局。兴宗朝似从扩张走向收缩,在均势中谋取主动,对漠北、燕云、高丽、西夏等问题进行分析,“重熙增币”使辽在战略相持中获主动权,仍需重视燕云布防。

4. 兴宗朝的对夏关系

辽夏关系问题是兴宗朝边疆经略的重点,学者指出,兴宗朝对外关系重点已转移至西南部^[31],学界研究主要围绕与夏战盟、地缘政治和设立西京展开。李锡厚分析辽夏和战问题,指出辽在对夏战争中失败后开始重视加强西南防务,并发现“西夏在很大程度上握有主动权”^[32]。张正明在论述辽与邻国邻部问题时,对辽夏关系主要涉及重熙年间战和问题。^[33]李桂芝亦指出,辽无力征服西夏,又重视与宋的关系,两次对夏战争的失利,利用矛盾从中渔利成为三方得利最多者。^[34]杜建录认为,辽夏之间虽有战争,但和平友好和互相援助是主流。^[35]李华瑞在论述辽宋关系时认为,辽充当夏、宋之间矛盾“仲裁人”的角色,其宗旨是维持已有“国际”秩序的现状。在宋夏对抗中,“西夏渐弱,故辽在斡旋中多偏西夏,或为西夏声援,具有扶弱抑强的特点。”^[36]另外,杨浣的《辽夏关系史》^[37]亦有大量论述。彭向前认为辽为与宋的竞争构建国际秩序及获取经济利益,在西夏势力增强欲摆脱控制时于多方面采取遏制措施,辽兴宗时期的辽夏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交恶的重大转变,包括贸易限制、伐夏战争、请婚问题以及与西蕃(河湟吐蕃)的关系问题。^[38]陈德洋认为三次辽夏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辽朝正统意识增强与西夏建国后态度转变,而战争最终造成双方国力损耗、关系破裂,最终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格局,期间双方经历复杂的战争过程与艰难议和过程。^[39]同时,亦有学者指出,辽兴宗的崇儒思想推动辽朝处理民族关系转变,摒弃传统的“华夷之辨”且试图树立辽朝正统地位,但仍有民族歧视观念。^[40]兴宗执政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汉契文化交融,辽朝实现与宋平等政治地位,契丹以华夏正统自居观念强化的过程,反映了契丹辽正统观念的加强和中华一体认同的发展。^[41]王万志详细论证兴宗朝应对西夏事态变化所采取的阶段性举措,分析其曲折发展历程,指出辽夏封贡关系围绕

政治利益展开,在辽朝的封贡体系中,西夏与辽朝属国属部统辖下的边疆部族地位明显不同。^[42]

辽之五京问题一直是学界热点,其中,西京的设置是兴宗朝政区变置的重要举措之一。陈述指出,因西京之重要地位而升为大同军,是帮助辽以扼西南边防,其与南京(面燕蓟)、东京(镇东丹)共同形成了“三京拱卫内地(草原)”的国家陪都体系。^[43]杨若薇认为,兴宗“将西南重镇大同升为西京,与西夏政权有很大关系”^[44]。大同军地处“魏都旧地,朔野奥区,一隅正控于河西,两地本邻于代北”^[45],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石刻资料中,对于契丹对核心圈域之侧重点认知亦有变化,如太平三年(1023年)《耶律道清墓志》“先皇帝欲肃浩穰之地,全资英杰之材,擢向龙庭,俾临鹤野。令出而下民神伏,政行而千里风清。西望闾山,共显擎天之势;东闻辽水,同轮朝海之程。”可见契丹人对临潢之地的重视高于其他。至重熙二十年(1051年)《平原公主墓志》“我朝太祖,国姓耶律。吞二辽以建极,降三晋以来庭。圣宗大孝宣皇帝纘五圣以承祧,统八紘而阐化,云屯臣妾,辐辏车书。”此便涉及更宏大的“八紘”天下观。康鹏对重熙十三年西京设立亦有专论,他分析指出,山西地区在辽前中期已在各方面表现出独立区域的趋势,辽之西京都部署司是针对北宋的,而真正用于防御西夏的机构是西南面招讨司。^[46]余蔚认为,《武经总要·北蕃地理》^[47]的记载比《辽史·地理志》更详细,因其成书时间与重熙年间相对接近,故可弥补重熙年间政区沿革断面的缺陷。^[48]杨蕤认为,在河套地区设置的清河军和金肃军是为了对西夏进行军事威慑和控制丝路贸易的意图。^[49]陈俊达在论及“隶/属”相应军事机构时,亦论及清河军和金肃军,他认为二者应属辽边界边防城,是出于军事需要和征伐西夏而置。^[50]有学者认为,通过“异常”的政区设置,体现王朝如何灵活运用不同类型的政区来管辖不同的区域,利用巧妙的治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的“一统体制”上进行灵活调整来达到“有效治理”。^[51]这似应对辽之建置分析提供新思路。

5. 兴宗朝对东疆、北疆的经略以及巩固草原丝路诸问题

辽兴宗对东疆^[52]、北疆以及巩固草原丝路同样重视,笔者认为,这缘于契丹统治集团自身实力增强、外交意识转变以及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姚从吾认为,澶渊之盟的签订后,被视为“夷狄”的辽朝取得了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宋朝“对等的互相尊重的外交关系”。^[53]魏志江认为宋辽金元时代,被视为“夷狄”的北族王朝取得与宋对等的国际地位,先后崛起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战略中心,并与周边国家建立宗藩体制,其结构呈现出“华夷变态”的格局。^[54]兴宗即位之初,高丽意图削弱辽东疆防备,辽丽转而交恶。后来,辽丽关系逐渐恢复,高丽对辽的朝贡活动日趋频繁,辽将高丽严格限制在宗藩秩序中。^[55]陈俊达认为,辽丽关系经过一系列的战和态势后,交聘活动逐渐制度化,自重熙七年后,高丽行辽年号,直至天庆六年金克东京,辽对东疆的丧失主导权停奉辽正朔。^[56]美国学者发现,辽兴宗去世时将自己的一些财产遗赠给了当时在辽都的高丽使节,这一事件反映了辽与高

丽之间在特殊时期的外交互动和礼物交换传统，可以显示出，在重大事件中，基于双方长期以来在外交礼仪方面有一定的互动惯例。^[57]关于女真问题，郑毅指出，大延琳起义使得女真各部普遍对辽有了轻视之心，而辽朝贵族认为女真各部实力有所增长，已经可以隐约抗衡辽，虽兴宗朝东征再度控制了女真各部，但经略多流于羁縻，生女真割据势力的实力仍然在增强。^[58]程妮娜认为圣宗以来逐步将州县地区内的女真属国、属部纳入地方统辖体系，州县之外地区的生女真部和州县边缘地区的铁骊女真部一直诣捺钵朝贡。兴宗朝后期铁骊女真到辽内地朝贡次数锐减，并不是辽对铁骊统辖减弱，而是辽将铁骊纳入地方统治体系的结果。^[59]孙昊认为在兴宗时代，圣宗对鸭绿江女真进行分割，未归附和逃离的女真人并没有完全臣服于辽，仍然与其对抗，直到耶律仁先等对该地区进行经略之后，才使该地区得以稳定。^[60]

对于北疆及经略丝路问题，林荣贵认为，辽致力于北疆东北、北部和西北广大民族地区的经略，加大管辖力度，发展经济，比唐之羁縻式管理更进一步，密切了北疆境内各地区、各族之间的联系。^[61]魏志江认为，兴宗鉴于圣宗朝对属部的压制以致阻卜诸部叛乱的教训，多加抚赐以笼络，进行朝贡贸易，漠北复趋稳定，以维持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62]兴宗朝重视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经营，早前辽对漠北的经营和控制为经略西南提供了基础。随着阴山道的日益重要，涉及辽保护好草原丝绸之路的南线，辽夏战争不可避免。^[63]西南路招讨司还负责辽与西突厥、吐谷浑的关系及与西北路共控西北诸部族等职责，从而确保草原丝路安全。^[64]程嘉静认为，辽和阿萨兰回鹘在兴宗朝曾有过联姻，通过和亲以消除辽在丝路贸易上的障碍，并进一步加强同西域的联系。^[65]魏志江、杨立中对辽与波斯、大食和阿萨兰回鹘等内陆亚洲国家和政权的交流有专题研究，同时对辽与内陆亚洲国家和政权草原丝路交通进行了系统分析。^[66]

6. 结语

纵观学术史，辽兴宗朝边疆经略问题研究的范式不断提升、内容不断深入、主题不断细化，但以往研究多倾向于对王朝的发展走势展开宏观性的评析，抑或是针对其中某一事件、某一制度、某一现象所引发的治乱兴衰状况进行深入研究。这种长时段的宏观构型与短时段微观切入的研究视角，对于研究北方民族建立的辽朝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辽朝一方面承载着自身传统力量的深厚底蕴，那是其民族文化与习俗交织而成的独特根基；另一方面，又与中原政治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对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边疆经略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对这一时期战略性与复杂性的深刻体现。辽兴宗统治时期正值辽朝步入中后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更为复杂与动荡，是否成功构建起行之有效的边疆秩序，成为一个极具深度、值得深入挖掘与探讨的重要问题。

近数十年来，中外学界围绕辽兴宗朝的边疆经略问题展开探讨，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研究仍呈现碎片化态势。研究困境主要源于研究视角的矛盾，史料的极度缺乏，以及多方政权文献对同一事件的叙事差异，使得核心问题尚未形成共识，对于模糊的概念仍缺乏进一步界定和讨论。目前，前

沿研究已展现出新的范式，主要围绕从契丹小字等新材料入手，发挥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优势，有效重构辽朝边疆经略问题的实态。是故，除了深度挖掘边缘史料之外，从更宏观视野和多学科理论角度入手，利用不同视阈考察北方民族政权的边疆经略问题，应是未来的学界的发展趋向之一。

References

1. 郑毅(2019). 辽朝的建立及其边疆经略——契丹与漠北中原东北的地缘政治变迁. 东北大学出版社.
2. 姚从吾(1972). 姚从吾先生全集（二）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 正中书局.
3. 朱筱新(1988). 评辽在夏、宋关系中的作用.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1). 54-58.
4. 林荣贵(1995). 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辽之封贡问题应做一系统考论，辽金易代金虽受“华夷体系”的影响和制约，曾赴辽请求封册，但并非“夷”要受“华”封册的传统去请求华夏汉族政权封册，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并未真正实现封贡，而是试图颠倒封册以凌驾于辽之上，导致封册失败。（赵丽(2017). 金人请求辽朝封册考论. 史学集刊. (06). 113-124.）笔者以为，北方民族政权应从不同视角分析。
6. 魏志江,潘清(2023). 论辽朝的世界秩序. 学术月刊. (12). 160-172.
7. 万晓(2017). 朝贡的名实与朝贡之外的东亚——分类框架、案例举隅与研究建议. 国际政治科学. (3). 63-104.
8. 郭康松(2001). 辽朝夷夏观的演变. 中国史研究. (02). 90-96.
9. 刘浦江(2017).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中华书局.
10. 赵永春(2010). 试论辽人的“中国”观. 文史哲. (3). 78-90.
11. 赵永春,李玉君(2010). 辽人自称“中国”考论. 社会科学辑刊. (5). 143-149.
12. 苗润博(2024). 重构早期契丹史. 中华书局.
13. (元)脱脱(2022). 金史. 中华书局.
14. 李大龙(2015). 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 人民出版社.
15. 刘浦江(2017). 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 中华书局.
16. (元)脱脱(2017). 辽史. 中华书局.
17. Owen Lattimore(2005). 唐晓峰(译). 中国的亚洲内陆

- 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江苏人民出版社.
18. 程妮娜等(2017). 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 李锡厚(2006). 中国历史: 辽史. 人民出版社.
 20. 舒焚(1984). 辽史稿. 湖北人民出版社.
 21. 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2024). (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2. 陈述(2014). 契丹政治史稿. 山西人民出版社.
 23. 陶晋生(2008). 宋辽关系史研究. 中华书局.
 24. 王明荪(1981). 宋辽金史论文稿. 明文书局.
 25. 林鹄(2022). 忧患: 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6. 刘春玲(2002). 论汉人官僚集团在辽政权中的作用. 阴山学刊. (02). 65-67.
 27. 郑伟佳(2008). 试论“重熙增币”.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02). 29-31+35.
 28. 马晓伟(2013). 庆历通宝与“庆历增币”浅议. 华夏文化. (02). 27-28.
 29. 李桂芝(1996). 辽金简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30. 朱小琴(2000). 宋辽“关南地之争”.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02). 61-66.
 31. herbert franke, Denis Twitchett, John Wolfe Dardess(1998). 史卫民(译).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2. 李锡厚(2001). 临潢集. 河北大学出版社.
 33. 张正明(1979). 契丹史略. 中华书局.
 34. 李桂芝(1984). 辽金简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35. 杜建录(2017). 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史. 甘肃文化出版社.
 36. 李华瑞(2010). 宋夏关系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7. 杨浣(2010). 辽夏关系史. 人民出版社.
 38. 彭向前(2003). 试论辽对西夏的遏制政策. 西北民族研究. (04). 49-54.
 39. 陈德洋(2019). 辽兴宗时期辽与西夏战争琐议. 西夏学. (02). 60-68.
 40. 马晓丽,孙政(2011). 辽兴宗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2). 52-57.
 41. 冯璐(2022). 谥号调整与民族交融——以辽圣兴两朝帝后谥号调整为中心. 青海民族研究. (03). 170-177.
 42. 王万志(2017). 辽夏封贡关系探析. 史学集刊. (05). 53-64.
 43. 陈述(1978). 契丹社会经济史稿.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4. 杨若薇(2022).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5. 周阿根(2022). 辽代墓志校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46. 康鹏(2023). 辽代五京体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7. 新近陈晓伟对《北蕃地理》有详细考证, 主体框架时间截止到兴宗重熙十年, 该书恐非取材宋方文献, 而是来自一份契丹本土资料, 会逢赵至忠从辽朝投宋, 曾多次向宋廷献书, 当数《虏廷杂记》最为重要, 此为编写《北蕃地理》提供了参考资料. 陈晓伟(2024). 《北蕃地理》引书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03). 160-168.
 48. 余蔚(2017).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49. 杨蕤(2003). 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06). 28-31.
 50. 陈俊达(2022). 辽朝军事区划体系研究——兼论辽代“道”“路”诸问题. 史学集刊. (03). 55-67.
 51. 胡恒(2022).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 清代厅制再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2. 另有海疆经营问题应注意, 辽“肇国辽东”, 对东疆防务历来重视, 兴宗时有“造战舰, 成楼船百三十艘, 上置兵下立马, 规制坚壮”事, 着力构筑军政相维的海防体系. 刘俊珂(2023). 辽代海疆的开拓及其经营特色探论.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01). 155-165+216
 53. 姚从吾(1972). 姚从吾先生全集(二)辽金元史讲义——甲: 辽朝史. 正中书局.
 54. 魏志江(2014). 宗藩体制: 东亚传统国际安全体制析论. 现代国际关系. (04). 40-46+64.
 55. 黄金辉,袁迪嘉(2021). 辽丽关系视域下辽朝的东疆经略. 东疆学刊. (01). 71-80.
 56. 陈俊达(2022). 从“交邻”到“封贡”: 高丽与辽朝交聘研究. 万卷楼出版社.
 57. Hansen, V(2015). International Gifting and the Kitan World, 907-1125.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3). 273 – 302.
 58. 郑毅(2018). 契丹王朝东北边政述论——以辽与女真关系为中心. 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九辑). 科学出版社.
 59. 程妮娜(2015). 女真与辽朝的朝贡关系. 社会科学辑刊. (04). 101-110.
 60. 孙昊(2010). 辽代的辽东边疆经略——以鸭绿江女真为中心的动态考察. 贵州社会科学. (12). 105-108.
 61. 林荣贵(2000). 北宋与辽的边疆经略. 中国边疆史地

- 研究. (01). 24-46.
62. 魏志江(2017). 论辽帝国对漠北蒙古的经略及其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影响. 社会科学辑刊. (03). 114-121.
63. 武玉环,程嘉静(2014). 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 求索. (07). 158-162.
64. 何天明(1990). 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 内蒙古社会科学. (06). 66-70.
65. 程嘉静(2011). 辽代对丝绸之路之经营. 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编. 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 辽宁教育出版社.
66. 魏志江,杨立中(2019). 论辽与内陆亚洲的关系. 江海学刊. (02). 163-171.